

# 论明代复古派对杜诗的态度

李思涯

内容提要 明代复古派在辨体的过程中发现，杜诗既“高于盛唐”又“不失为盛唐”，并试着分析“高于盛唐”而“不失为盛唐”的具体特征。“高于盛唐”为学杜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复古派针对杜诗的这种两面性特点提出了特别的学习方法：五律与排律，先学初盛诸家，然后老杜；七律，以老杜为主，融合高、岑的格调与王、李的风神。复古派坚信，宋人和明人虽都学杜，但完全不同，其中有唐、宋的区别。这种观点影响了清代诗论家的看法。

关键词 复古派 辨体 杜诗 高于盛唐

明代是个诗学发达的时代，对唐诗的探讨超过以前。明代复古派发现了杜诗的一个问题：杜诗有“高于盛唐”的一面，又有“不失为盛唐”的一面。“高于盛唐”为学杜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复古派是如何发现这个问题的？“高于盛唐”的是什么？“不失为盛唐”的又是什么？又该怎么面对杜诗的两面性？如果要学杜诗，该如何去学？本文集中讨论明代复古派诗论关于杜诗的看法，以展现其别致之处。

## 一 “高于盛唐”的提出

王世懋（1536—1588）在《艺圃撷余》中说：

少陵故多变态，其诗有深句，有雄句，有老句，有秀句，有丽句，有险句，有拙句，有累句。后世别为大家，特高于盛唐者，以其有深句、雄句、老句也；而终不失为盛唐者，以其有秀句、丽句也。<sup>①</sup>

认为杜甫的诗变化多端，因为有“深句”、“雄句”、“老句”，故而比盛唐其他诗人要高出一层；然而杜诗又有“秀句”、“丽句”，与盛唐诗人一样，故而“不失为盛唐”。王世懋提出了杜诗“高于盛唐”而“不失为盛唐”的观点。不单王世懋这样讲，胡应麟（1551—1602）也有类似的说法：

李才高气逸而调雄，杜体大思精而格浑。超出唐人而不离唐人者，李也；不尽唐调而兼得唐调者，杜也。<sup>②</sup>

胡应麟比较李、杜时，指出李白“超出唐人”但“不离唐人”，杜甫是“不尽唐调”而“兼得唐调”。只从字面上看，胡应麟比王世懋的否定性更强一些，因为王世懋的“高于唐盛”而“不失为盛唐”还是暗含着强调杜诗为盛唐诗，而胡应麟的“不尽唐调”暗示其有杂质，“兼得唐调”暗示“唐调”非杜诗的主体。但事实上，他们的想法基本一致，因为王世懋也说：

予谓学于鳞不如学老杜，学老杜尚不如学盛唐。何者？老杜结构自为一家言，盛唐散漫无宗，人各自以意象声响得之。正如韩、柳之文，何有不从左、史来者。彼学而成，为韩为柳。我却又从韩、

① 王世懋《艺圃撷余》，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77页。

② 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70页。

柳学，便落一尘矣。轻薄子遽笑韩、柳非古，与夫一字一语必步趋二家者，皆非也。<sup>①</sup>王世懋认为，诗在盛唐还是散漫无宗、各有自己面目，到老杜就“结构自为一家言”，从盛唐到老杜是一个“从多归一”发展的过程。并且，从他类比的例子中看出，在“于鳞——老杜——盛唐”这个线条中，越往后越具有较高的价值。韩愈（768—824）、柳宗元（773—819）之文是学《左传》、《史记》，韩、柳学到了左、史精髓因此才被称为韩、柳之文，现在如果想学文章，但只就韩、柳来学，“便落一尘”。也就是说，没有遵照严羽所谓的“入门须正，立志须高”，是“学其中斯为下矣”<sup>②</sup>。所以说，学“老杜”不如学“盛唐”，“老杜”终究与“盛唐”有别。用胡应麟的话明白直接地说就是：

盛唐一味秀丽雄浑。杜则精粗、巨细、巧拙、新陈、险易、浅深、浓淡、肥瘦，靡不毕具，参其格调，实与盛唐大别。其能会萃前人在此，滥觞后世亦在此。<sup>③</sup>杜诗格调“与盛唐大别”，“大别”的原因，就在于“少陵故多变态”、精粗、巨细、巧拙等“靡不毕具”的变化多端与相容并包。有趣的是，这种“集大成”<sup>④</sup>，历来是被称赞的优点，在明代却变成了“杜诗”与“盛唐”产生差别的原因。

在明代，不单单只有王世懋、胡应麟指明了这个问题，之前的明人都留意到了这个问题，如李东阳（1447—1516）：

唐诗类有委曲可喜之处，惟杜子美顿挫起伏，变化不测，可骇可愕，盖其音响与格律正相称。回视诸作，皆在下风。然学者不先得唐调，未可遽为杜学也。<sup>⑤</sup>

李东阳说学长篇的人若“不先得唐调”就“未可遽为杜学”，提出了“唐调”和“杜学”两个概念，虽没指明其间的区别，但表明李东阳感觉到了这是个问题。同样，李攀龙也是如此，在《选唐诗序》中说：

七言律体，诸家所难，王维、李颀颇臻其妙，即子美篇什虽众，隳焉自放矣。<sup>⑥</sup>李攀龙认为杜甫的七律与王维（701—761）、李颀（690？—751？）的“颇臻其妙”不同，特点是篇什虽多但“隳焉自放”。李攀龙认为王、李的七律是盛唐的典范之作，杜诗“隳焉自放”就隐含着杜诗与盛唐的差别。

王世懋、胡应麟明确提出这个问题之后，复古派后继者的许学夷（1563—1633）也持这个观点：

或问：“子美五七言律，较盛唐诸公如何？”曰：盛唐诸公，惟在兴趣，故体多浑圆，语多活泼。若子美则以意为主，以独造为宗，故体多严整，语多沉着耳。此各自为胜，未可以优劣论也。<sup>⑦</sup>许学夷拟想设问的问题就暗示了他的立场：子美的五七言律诗不同于盛唐诸公，是两码事。他接着也直接阐发了他的立场，盛唐的“兴趣”不同于杜诗的“以意为主”、盛唐的“体多浑圆”区别于杜诗的“体多严整”、盛唐的“语多活泼”差异于杜诗的“语多沉着”。并且，这有所区分的两者“各自为胜”。许学夷这种态度同样表现在他赞同胡应麟的观点上：

① 王世懋《艺圃撷余》，第778页。

② 严羽《沧浪诗话》，《历代诗话》，第687页。

③ 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四，第70页。

④ 杜诗集大成前代多有述及，如韩愈《题杜工部坟》“独有工部称全美”、元稹（779—831）《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华文轩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杜甫卷》上编，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1、15页）；如姜夔（1155？—1221？）《白石诗说》“杜子美独能兼之”（《历代诗话》，第681页）；又如严羽《沧浪诗话》“少陵诗，宪章汉魏而取材于六朝。至其自得之妙，则前辈所谓集大成者也”（《历代诗话》，第697页）；又如蔡梦弼（1204前后在世）《杜工部草堂诗话》“子美亦集诗之大成欤”（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94页）。

⑤ 李东阳《麓堂诗话》，《历代诗话续编》，第1373页。

⑥ 李攀龙《选唐诗序》，《古今诗删》卷一〇，《四库全书》集部第138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91页。

⑦ 许学夷著、杜维沫校点《诗源辨体》，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14页。

胡元瑞最爱老杜“风急天高”一篇，反复赞叹，凡数百言，要皆得于影响。惟云：“一篇之中，句句皆律，一句之中，字字皆律，锱铢钩两，毫发不差。”又云：“微有说者，是杜诗，非唐诗耳。”

此论可谓独得。然此篇在老杜七言诚为第一，但第七句即杜体亦不免为累句。<sup>①</sup>

胡应麟在《诗薮》中说杜甫《登高》：“一章五十六字，如海底珊瑚，瘦劲难名，沉深莫测，而精光万丈，力量万钧。通章章法、句法、字法，前无昔人，后无来学。微有诋者，是杜诗，非唐诗耳。”<sup>②</sup>许学夷认同胡应麟的看法，认为此诗是“杜诗”而非“唐诗”。

在王世懋看来，他这样区别杜诗的根源是高棅（1350—1423），《唐诗品汇》中做了“后世别为大家，特高于盛唐者”这样的事。高棅在《唐诗品汇·序》中说：

开元、天宝间，则有李翰林之飘逸，杜工部之沉郁，孟襄阳之清雅，王右丞之精致，储光羲之率直，王昌龄之声俊，高适、岑参之悲壮，李颀、常建之超凡，此盛唐之盛者也。<sup>③</sup>

高棅明确指定“杜工部之沉郁”是“盛唐之盛者”，杜甫属于盛唐诗人无疑。不过，在《凡例》中高棅又将盛唐细分：

大略以初唐为正始，盛唐为正宗、大家、名家、羽翼，中唐为接武，晚唐为正变、余响，方外异人等诗为傍流，间有一二成家特立与时异者，则不以世次拘之，如陈子昂与太白列在正宗，刘长卿、钱起、韦、柳与高、岑诸人同在名家者是也。<sup>④</sup>

高棅认为，除少数诗人之外，大体来说，正宗、大家、名家、羽翼都是盛唐诗人。在高棅所分的七种体式的诗歌中，杜甫的五古、七古、五律、五言排律、七律五类都是大家，只有五绝、七绝被列为羽翼。不过，不管是“大家”还是“羽翼”，杜甫都是属于盛唐的。然而，有趣的是，杜甫的这个“大家”是被单列出来的，在“大家”这个分目之下，只有杜甫一人。也就是说，“大家”只此一家，别无分号，“大家”这个名号就是专为杜甫一人准备的。这也就是王世懋的说法——“别”为大家。

高棅一方面把杜甫列为盛唐，一方面又把杜甫从正宗、名家、羽翼中单独分别出来，而不像盛唐的王维、李颀基本上都被安排在“正宗”、“名家”之内。那么，“正宗”与“大家”到底有何区别？以七言律为例，“正宗”有崔颢、李白、贾至、王维、李颀、李颀、孟浩然、岑参、高适、王昌龄等十四人，高棅说：

盛唐作者虽不多，而声调最远，品格最高。若崔颢律非纯雅，太白首推其《黄鹤》之作，后至《凤凰》而仿佛焉；又如贾至、王维、岑参《早朝》倡和之什，当时各极其妙，王之诸作尤胜诸人；至于李颀、高适，当与并驱，未论先后。是皆足为万世程法。通得十四人，共诗五十二首，为正宗。<sup>⑤</sup>

在七律中，杜甫为“大家”，高棅这样说：

少陵七言律法独异诸家，而篇什亦盛，如《秋兴》等作，前辈谓其大体浑雄富丽，小家数不可仿佛耳，今择其三十七首为大家。<sup>⑥</sup>

比较这两种说法，可以看出，在“正宗”中所说的“盛唐作者虽不多”的盛唐作者是不包括杜甫的。高棅所选择的十四人，“声调最远，品格最高”，因而“足为万世程法”，可供后世学习；而杜甫“律法独异诸家”，和众人不同，虽然“大体浑雄富丽”，但“小家数不可仿佛耳”，就是说，不能被轻易学习。可以看出，在“正宗”与“大家”的区别中，能不能被学习，成了区分的关键。同样，在五言律中，

① 许学夷《诗源辨体》，第217页。

② 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五，第95页。

③ 高棅《唐诗品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8页。

④ 高棅《唐诗品汇》，第14页。

⑤⑥ 高棅《唐诗品汇》，第706页。

杜甫“大家”一样被说成是“杜公律法变化尤高”<sup>①</sup>。高棅选编《唐诗品汇》是为了便于学习唐诗,因此,从容易不容易学习的角度区分“正宗”与“大家”在高棅看来理所当然。

王世懋认为把杜甫“别为大家”的源头是高棅的《唐诗品汇》,其实,这只是因为复古派受《唐诗品汇》影响很大而已<sup>②</sup>。把杜甫的问题提出来的时间更早,如元代方回(1227—1305)《瀛奎律髓》卷一〇“春日类”评杜甫《曲江二首》:“但诗三用‘花’字,在老杜则可,在他人则不可。”卷一二“秋日类”评杜甫《秋清》:“此老杜诗似晚唐者。”评《秋野》:“在老杜则可,若我辈且当作‘衰老甘贫病’,然不如‘老’之语健意足也。”<sup>③</sup>《唐诗品汇》中“小家数不可仿佛耳”的说法类似《瀛奎律髓》中常见的“在老杜则可,在他人则不可”的说法。并且《瀛奎律髓》中还指出杜诗不像盛唐,而是“似晚唐”的。不过,方回没有明确提出明人那种“高于”而“不失”的看法。当然,方回的认识更早可以上溯到宋代,宋代已经有不少人提到“杜诗”和“唐诗”的区别<sup>④</sup>。不过,本文要探讨的问题是在《唐诗品汇》分别了初、盛、中、晚四唐说之后“杜诗”与“盛唐”的关系。

## 二 辨体带出的问题

明人的辨体观念很强烈。前后七子复古派在辨体时发现了杜诗的问题。何景明(1483—1521)《明月篇序》说:

仆始读杜子七言歌诗,爱其陈事切实,布辞沉着,心窃效之,以为长篇圣于子美矣。既而读汉魏以来歌诗……乃知子美辞固沉着,而调失流转,虽成一家之语,实则诗歌之变体也。<sup>⑤</sup>

何景明总结了他学诗过程中一个惊人的发现:在他开始读杜甫的七言歌行的时候,杜甫的“陈事切实,布辞沉着”非常出众,让他十分佩服,暗暗学习,觉得七言长篇到杜甫已经入圣;不过随着他继续读汉魏以来的诗歌,慢慢觉得杜甫“辞固沉着,而调失流转”,与汉魏以来的已经不同,所以他认为杜甫虽然成一家之语,但实在是诗歌的“变体”。“调失流转”导致了七言歌行“体”的变化。

在复古派看来,不仅杜甫七言歌行是种“变体”,律诗、绝句也有一些问题,《艺苑卮言》说:

太白之七言律,子美之七言绝,皆变体,间为之可耳,不足多法也。

虽老杜以歌行入律,亦是变风,不宜多作,作则伤境。<sup>⑥</sup>

王世贞(1526—1590)提出老杜七言绝句是“变体”、以歌行入律是“变风”,明显也是诗歌“辨体”的思路。

① 高棅《唐诗品汇》,第507页。

② 陈国球认为,高棅从《唐诗品汇》删改而来的《唐诗正声》在嘉靖以后声誉及流行程度急涨,与中后期复古诗论的诗史意识渐次凸显有辩证的关系。见陈国球《明代复古派唐诗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5—191页。

③ 方回选评、李庆甲集评校点《瀛奎律髓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358、422、425页。

④ 蒋寅提到:朱仕琇《梅崖居士文集》卷一八《鲁远怀诗序》云:“昔余与瑞金杨侍御(默堂)论诗京师,侍御力持唐音,而余主杜甫,不相下。”予读至此而窃有疑焉,杜甫乃非唐音乎?既而阅尤珍《介峰札记》卷三:“自唐以后诗人有学杜者,有学盛唐者,宗派不同,学诗者宜致审焉。”乃悟乾隆初年正当康熙朝唐宋诗之争方偃,所谓唐音有特指之义,即王渔洋《唐贤三昧集》所主之盛唐之音也。故主杜甫则异其趋,与主唐音者不相入。考“唐人”与杜甫之对立,盖自宋已然。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二因陈与义语曰:“唐人皆苦思作诗……故造语皆工,得句皆奇,但韵格不高,故不能参少陵之逸步。”此所谓唐人,即主苦吟之晚唐人也,故与杜对举。叶水心《水心文集》卷一二《徐斯远文集序》云:“庆历、嘉祐以来,天下以杜甫为师,始黜唐人之学,而江西宗派章焉。”此将唐人与杜甫对言。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五亦举杜甫《登高》,谓“是杜诗,非唐诗耳”。见蒋寅《金陵生小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9页。后几句为蒋寅告知笔者其新补充的部分。

⑤ 何景明《明月篇序》,蔡景康编选《明代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19页。

⑥ 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四,《历代诗话续编》,第1006、1009页。

同样，许学夷也持这样的看法，《诗源辨体》中称：

高岑五言不拘律法者，犹子美七言以歌行入律，沧浪所谓“古律”是也。虽是变风，然豪旷磊落，乃才大而失之于放，盖过而非不及也。<sup>①</sup>

高适（约700—765）、岑参（715—770）五律不拘律法，如同老杜歌行入律，都是“变风”，过犹不及。许学夷仔细地区分老杜七律的“正体”、“小变”、“大变”：

子美七言律，如“风急天高”、“重阳独酌”、“楚王宫北”、“秋尽东行”、“花近高楼”、“玉露凋伤”、“野老篱前”、“群山万壑”等篇，沉雄含蓄，是其正体，国朝诸公多能学之，而稳贴匀和，较胜。如“年年至日”、“近闻宽法”、“使君高义”、“曾为掾吏”、“寺下春江”等篇，其格稍放，是为小变，后来无人能学。至如“黄草峡西”、“苦忆荆州”、“白帝城中”、“西岳峻嶒”、“城尖径仄”、“二月饶睡”、“爱汝玉山”、“去年登高”等篇，以歌行入律，是为大变，宋朝诸公及李献吉虽多学之，实无有相类者。<sup>②</sup>

“正体”能学，“小变”无人能学，“大变”更是没人能学。如此精细地辨体算是达到了极致。

可见，复古派因为“辨体”的需要，而发现了杜诗古风与律诗的“变体”。这种“变体”促使他们对诗学理论的探讨更加精细。杜诗“高于”、“不失”两面性的特点直接关系到复古派诗史的建构。胡应麟认为：

唐七言律自杜审言、沈佺期首创工密。至崔颢、李白时出古意，一变也。高、岑、王、李，风格大备，又一变也。杜陵雄深浩荡，超忽纵横，又一变也。钱、刘稍为流畅，降而中唐，又一变也。大历十才子，中唐体备，又一变也。<sup>③</sup>

在胡应麟建构的七律史中，杜甫“雄深浩荡，超忽纵横”之所以造成“一变”，由于“变体”、“变风”而带来的“高于”而“不失”应该是最重要的因素。虽然胡应麟没有直接指明这二者之间的关系，但王世懋明确指出了。王世懋说：

唐律由初而盛，由盛而中，由中而晚，时代声调，故自必不可同。然亦有初而逗盛，盛而逗中，中而逗晚者。何则？逗者，变之渐也，非逗，故无由变。如诗之有“变风”、“变雅”，便是《离骚》远祖，子美七言律之有拗体，其犹“变风”、“变雅”乎？唐律之由盛而中，极是盛衰之介。然王维、钱起，实相倡酬，子美全集，半是大历以后，其间逗漏，实有可言，聊指一二。<sup>④</sup>

杜甫七言律的拗体，就是前人所谓的“变风”、“变雅”，“唐律之由盛而中，极是盛衰之介”，“子美全集，半是大历以后”，杜甫这些“变风”、“变雅”成为“盛唐”走向“中唐”的开始和标志。

### 三 “高于”与“不失”的两边

复古派对杜甫“高于”、“不失”的两边认识不完全相同。前边已经引到王世懋的话，在他看来“高于盛唐”指的是杜诗有“深句、雄句、老句”，而“不失为盛唐”指的是杜诗有“秀句、丽句”。王世懋又说过：“轻浅子弟，往往有薄之者，则以其有险句、拙句、累句也，不知其愈险愈老，正是此老独得处，固不足难之，独拙、累之句，我不能为掩瑕。”<sup>⑤</sup>其所称赞的“险句”应该也是“高于盛唐”的部分。

而胡应麟则认为盛唐的特点是“一味秀丽雄浑”，而杜甫则是“精粗、巨细、巧拙、新陈、险易、

① 许学夷《诗源辨体》，第158页。

② 许学夷《诗源辨体》，第218页。

③ 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五，第84页。

④ 王世懋《艺圃撷余》，第776页。

⑤ 王世懋《艺圃撷余》，第777页。

浅深、浓淡、肥瘦，靡不毕具”，格调与盛唐不同。胡应麟也承认杜甫是“不尽唐调”而“兼得唐调”，因此他所谓的“精粗、巨细、巧拙、新陈、险易、浅深、浓淡、肥瘦”中，就同时有“高于”与“不失”的两边，或者也可以说，“不失”的一边是盛唐的“秀丽雄浑”，“高于”的一边是“精粗、巨细、巧拙、新陈、险易、浅深、浓淡、肥瘦”中除去“秀丽雄浑”的那个部分。

跟王世懋比较，胡应麟多了一个观察，即：杜诗这个“高于”而“不失”的特点“会萃前人在此，滥觞后世亦在此”，包综了前人同时也开启了后世。胡应麟说：

大率唐人诗主神韵，不主气格，故结句率弱者多。惟老杜不尔，如“醉把茱萸仔细看”之类，极为深厚浑雄，然风格亦与盛唐稍异。间有滥觞宋人者，“出师未捷身先死”之类是也。<sup>①</sup> 胡应麟从唐诗的结句来考察，认为老杜诗的结尾“深厚浑雄”，与一般唐人“率弱”不同。如《九日蓝田崔氏庄》“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仔细看”极其“深厚浑雄”，但其格调与“盛唐”不同。此外，有些结句“滥觞宋人”，如《蜀相》的结尾“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似乎因涉及议论，与宋诗相类。“高于”而“不失”的问题在胡应麟那里，不仅有“老杜”与“盛唐”之别，还与“宋人”发生了关联。

胡应麟的观点刺激了许学夷，许学夷说：

元美尝欲于老杜“玉露凋伤”、“昆明池水”、“风急天高”、“老去悲秋”四篇定为唐人七言律第一，中虽稍有相诋，又皆无当。愚按：杜律较唐人体各不同无论，若“丛菊两开他日泪”，语非纯雅；“织女机丝虚夜月，石鲸鳞甲动秋风”，细大不称；“羞将短发还吹帽，笑倩旁人为正冠”，似巧实拙；故自“风急天高”而外，在杜体中亦不得为第一，况唐人乎？“老去悲秋”宋人极称之，自无足怪。<sup>②</sup>

王世贞推举为唐人七律第一的几首杜诗有问题，《秋兴八首》之一的“丛菊两开他日泪”大概因为不合“乐而不淫，怨而不怒”的原则，许学夷说它“语非纯雅”；《秋兴八首》之七的“织女机丝虚月夜，石鲸鳞甲动秋风”大约是因为其把“机丝”、“鳞甲”之细微的物象与“月夜”、“石鲸”之巨大的物象放在一起，对比差异太大，许学夷说它“细大不称”；《九日蓝田崔氏庄》的“羞将短发还吹帽，笑倩旁人为正冠”估计是因为“羞”、“短发”、“吹帽”、“笑倩旁人”、“正冠”这些极其细节的描写活灵活现，似乎很巧妙，但其构造出来的整体意象却给人以滑稽之感，许学夷说它“似巧实拙”。除“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登高》以外，王世贞举的这些诗在杜诗中都不能算是第一，何况在整个唐人之中呢？有趣的是，胡应麟从《九日蓝田崔氏庄》诗歌的结句中发现了杜诗风格“与盛唐稍异”，而许学夷则从同一首诗“羞将短发还吹帽，笑倩旁人为正冠”这个句子的“似巧实拙”中进一步发现了“宋人极称之”的原因。由此可见，胡应麟与许学夷对杜诗的论述路向基本上是一致的。许学夷比胡应麟更指向对宋人的批评，他说：

胡元瑞云：“盛唐句法浑涵，如两汉之诗，不可以一字求。至老杜而后，句中有奇字为眼，才有此，句法便不浑涵。”愚按：老杜五言律妙处，原不在眼，浅薄者但得其眼耳。<sup>③</sup>

许学夷所引用的胡应麟的观点在《诗薮》内编卷四：

盛唐句法浑涵，如两汉之诗，不可以一字求。至老杜而后，句中有奇字为眼，才有此，句法便不浑涵。昔人谓石之有眼为研之一病，余亦谓句中有眼为诗之一病。如“地坼江帆隐，天清木叶闻”，故不如“地卑荒野大，天远暮江迟”也。如“返照入江翻石壁，归云拥树失山村”，故不如“蓝水远从千涧落，玉山高并两峰寒”也。此最诗家三昧，具眼自能辨之。齐、梁以至初唐，率用艳字为眼，

① 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五，第87页。疑标点有误。

② 许学夷《诗源辨体》，第217页。

③ 许学夷《诗源辨体》，第216页。

盛唐一洗，至杜乃有奇字。<sup>①</sup>

胡应麟认为老杜的“地坼江帆隐，天清木叶闻”因为故意炼字，过于修饰，因而有“坼”、“隐”、“清”、“闻”这样的句眼<sup>②</sup>，因而不如“地卑荒野大，天远暮江迟”中的“卑”、“大”、“远”、“迟”来得自然；“返照入江翻石壁，归云拥树失山村”因有字眼“翻”、“失”<sup>③</sup>，反而不如“蓝水远从千涧落，玉山高并两峰寒”自然。比较胡应麟与许学夷的评论，胡应麟所讲的“齐、梁以至初唐，率用艳字为眼”到“盛唐句法浑涵”再到老杜之后“句中有奇字为眼”，只是对诗歌历史现象的一种描述；而许学夷则加入了“浅薄者但得其眼耳”的批评，此批评无疑指向宋人喜欢讨论的诗眼问题<sup>④</sup>。不管怎样，胡应麟与许学夷在杜诗两面性带来的“老杜一盛唐”之后，都附加上了杜诗与宋人的关系，即“老杜一盛唐一宋人”。

#### 四 调和的策略——以五、七言律学习为例

到底该如何学习杜诗呢？胡应麟认为：

近体先习杜陵，则未得其广大雄深，先失之粗疏险拗，所谓从门非宝也。<sup>⑤</sup>

学习近体，若先学习老杜，则因为不能得到杜诗的广大雄深，反而会先失之粗疏险拗，所以不是入门之途。那么，该先学什么呢？胡应麟指出：

学五言律，毋习王、杨以前，毋窥元、白以后。先取沈、宋、陈、杜、苏、李诸集，朝夕临摹，则风骨高华，句法宏赡，音节雄亮，比偶精严。次及盛唐王、岑、孟、李，永之以风神，畅之以才气，和之以真澹，错之以清新。然后归宿杜陵，究竟绝轨，极深研几，穷神知化，五言律法尽矣。<sup>⑥</sup>

对五律来说，学习途径是：先学初唐沈、宋、陈、杜、苏、李等人，次及盛唐的王、岑、孟、李诸人，最后学习杜陵，这样的话，才能“究竟绝轨，极深研几，穷神知化”，这样才算“五言律法尽矣”。对于排律来说：

作排律先熟读宋、骆、沈、杜诸篇，仿其布格措词，则体裁平整，句调精严。益以摩诘之风神，太白之气概。既奄有诸家，美善咸备，然后究极杜陵，扩之以阔大，浚之以沉深，鼓之以变化，排律之能事尽矣。<sup>⑦</sup>

胡应麟建立起来的排律学习途径是：先熟读宋、骆、沈、杜，然后“益以摩诘之风神，太白之气概”，最后“究极杜陵”，这样才算“排律之能事尽矣”。

可见，对于五律与排律来说，胡应麟提供的学习路径基本都是：初唐一盛唐一老杜，即：先学初、盛诸家，然后老杜。

对于七律，胡应麟的认识则与对五律、排律稍稍不同：

高、岑明净整齐，所乏远韵；王、李精华秀朗，时觉小疵。学者步高、岑之格调，舍王、李之风神，

① 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四，第67页。

② 杨载《诗法家数》：“字眼在第二、五字：地坼江帆隐，天清木叶闻。”（见《历代诗话》第730页）

③ 《苕溪渔隐丛话》卷一三引《吕氏童蒙训》云：“潘邠老言：七言诗第五字要响，如‘返照入江翻石壁，归云拥树失山村’。‘翻’字‘失’字是响字也。”（见胡仔纂集、廖明德校点、周本淳重订《苕溪渔隐丛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9页）

④ “诗眼”最早在北宋被提出来，宋范温的诗话就命名为《潜溪诗眼》，“诗眼”是宋人热衷讨论的问题之一。见罗时进《历代“诗眼”说述评》，《江苏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1990年第2期。

⑤ 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四，第59页。

⑥ 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四，第58页。

⑦ 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四，第76页。

加以工部之雄深变幻，七言能事极矣。<sup>①</sup>

七律既要学高、岑的格调，又要学王、李的风神，加上杜甫的雄深变幻，这样才能“七言能事极矣”。胡应麟提供的七律学习对象都是盛唐诸家，学习顺序也不再是时间上的先后关系，而是同时吸收盛唐诸家与老杜的优点。当然，胡应麟这样讲，和他对七律史的认识有关，他认为对七律来说，杜、沈首创，崔、李还杂有古意，到高、岑、王、李风格大备，基本上算成熟了<sup>②</sup>。因此典范不能在盛唐之前找寻。对于后世的七律来说，胡应麟还认为可以加上明代诸家作为七律的榜样：

七言律，唐以老杜为主，参之李颀之神，王维之秀，岑参之丽；明则仲默之和畅，于鳞之高华，明卿之沉雄，元美之博大，兼收时出，法尽此矣。<sup>③</sup>

与前边的说法一样，学七律，以老杜为主，学习盛唐李颀的神、王维的秀、岑参的丽和明代何景明的和畅、李攀龙的高华、吴国伦的沉雄和王世贞的博大。

胡应麟的分析较为详细，许学夷等人就没那么仔细，不过他们也和胡应麟有相似的看法。如许学夷说：

子美五七言律，命意创句与诸家不同。后之学者欲学子美，必须先学诸家，既而于子美果有所得，然后变调以学之，庶几不谬。不然，恐徒有重拙之叹，不能入其壶奥也。今之初学，辄慕子美，及问子美佳处，直儿童之见耳。故予论之如此，此前人所未道也。<sup>④</sup>

许学夷点明杜甫近体与其他诸家不同，因此想学杜甫，必须先从诸家学起。若直接想学老杜，就是不明形势的“儿童之见”。他自矜的“前人所未道”其实胡应麟已经讲过，前边所引的王世懋的说法“予谓学于鳞不如学老杜，学老杜尚不如学盛唐”也含有先学盛唐这样一层意思。

其实，先学他人然后学杜这样的思路，不是明代复古派的发明，宋人就有这样的讨论，如陈师道说：

黄诗韩文，有意故有工，左杜则无工矣。然学者先黄后韩，不由黄韩而为左杜，则失之拙易矣。<sup>⑤</sup>

不经过黄庭坚之诗、韩愈之文而去学杜甫之诗、《左传》之文，则会变得“拙易”，是有问题的。作为江西派三宗之一的陈师道代表了典型的江西派后继者的诗学取向：经由宋诗的典型代表黄庭坚而到达唐代的杜甫。当然，陈师道这样的取向是希望直接上溯至盛唐的明代复古派所鄙视的。谢榛（1495—1575）说：

许彦周曰：“作诗浅易鄙陋之气不除，熟读李义山、黄鲁直之诗，则去之。”譬诸医家用药，稍不精洁，疾复存焉，彦周之谓也。陈后山曰：“学者不由黄韩而为老杜，则失之浅易。”此与彦周同病。<sup>⑥</sup>

谢榛认为，许颢（南宋人，生卒不详）试图通过熟读李商隐（约813—约858）、黄庭坚的诗歌达到除去宋诗的浅易鄙陋之气的目的与途径，就如同陈师道企图通过黄庭坚通往老杜，都是南辕北辙。我们可以从谢榛的批评中清楚地看到宋、明诗学的差异所在。

## 五 学杜造成的唐、宋之别

杜诗从唐代开始就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宋、明两代近体学杜是主流。胡应麟谈论过很多宋人学杜和明人（特别是复古派）学杜的状况，如：

① 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五，第93页。

② 胡应麟认为：“唐七言律自杜审言、沈佺期首创工密。至崔颢、李白时出古意，一变也。高、岑、王、李，风格大备，又一变也。杜陵雄深浩荡，超忽纵横，又一变也。”（见《诗薮》内编卷五，第84页）

③ 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五，第83页。

④ 许学夷《诗源辨体》，第214页。

⑤ 陈师道《后山诗话》，《历代诗话》，第305页。“左杜”原作“老杜”。

⑥ 谢榛《四溟诗话》卷二，《历代诗话续编》，第1157页。

宋人学杜得其骨，不得其肉；得其气，不得其韵；得其意，不得其象，至声与色并亡之矣。

杜诗正而能变，变而能化，化而不失本调，不失本调而兼得众调，故绝不可及。国朝明卿得杜正，不得其变；献吉得杜变，不得其化。

献吉于杜得其变，不得其正，故间涉于粗豪；于鳞于杜得其正，不得其变，故时困于重复。

若制作弘多，体格周备，竟当属之 州。<sup>①</sup>

大体上，胡应麟认为，宋人学杜问题很大：得骨不得肉，得气不得韵，得意不得象，至于声与色则完全没有；明朝诗人学杜也有很多问题，如：吴国伦（1524—1593）得正不得变，李梦阳（1473—1530）得变不得化，李攀龙得正不得变，比较起来王世贞则好很多。虽然宋、明学杜都有问题，但是，胡应麟认为宋人学杜与国朝学杜的差别还是很大的：

杜五言律，规模正大，格致沉深，而体势飞动。自宋以来，学杜者但刻意深沉，如枯槁朽株，无复生意。惟献吉于杜体势最亲。所恨者陶冶未融，刻削时露，且于正大沉深处，反欠工夫耳。

至句语偶尔相犯，岂足为疵，观其安身立命可也。<sup>②</sup>

胡应麟认为，杜甫的五言律，宋代人致力于学习其深沉，但结果无生意；到了明代的李梦阳，虽然有不少问题，但“于杜体势最亲”。“句语偶尔相犯”的问题也不足为瑕疵。

老杜七言拗体，亦当时意兴所到，盛唐诸公绝少。黄、陈偏欲法此，而不得其顿挫辟阖之妙，遂令轻薄子弟以学杜为大戒。近献吉亦坐此，然其才力雄健，合作处尚可并驰。<sup>③</sup>

老杜的七言拗体，宋代的黄庭坚、陈师道致力学习，却不得“顿挫辟阖”的精妙之处；而到明代的李梦阳，同样学习拗体，因为才力雄健，所以“合作处尚可并驰”，比黄、陈高出一截。

老杜七言律全篇可法者，《紫宸殿退朝》、《九日》、《登高》、《送韩十四》、《香积寺》、《玉台观》、《登楼》、《阁夜》、《崔氏庄》、《秋兴八篇》，气象雄盖宇宙，法律细入毫芒，自是千秋鼻祖。异时微之、昌黎，并极推尊，而莫能追步。宋人一概弃置，惟元虞伯生、杨仲弘得少分。至近日诸公，始明此义。<sup>④</sup>

胡应麟举出老杜七言律全篇“气象雄盖宇宙，法律细入毫芒”可以作为“千秋鼻祖”师法的那些诗，宋人却“一概弃置”，见识浅薄；而到明代诸公，“始明此义”，懂得了这些诗篇的价值，宋、明人见识之高下可见一斑。

老杜好句中叠用字，惟“落花游丝”妙绝。此外，如“高江急峡”、“小院回廊”，皆排比无关妙处。

又如“桃花细逐杨花落”、“便下襄阳向洛阳”之类，颇令人厌。唐人绝少述者，而宋世黄、陈竞相祖袭。国朝献吉病亦坐斯。嘉、隆一洗此类并诸拗涩变体，而独取其雄壮阔大句语为法，而后杜之骨力风格始见，真善学下惠者。<sup>⑤</sup>

老杜喜欢用叠字，宋代的黄、陈喜欢沿袭这些“排比无关妙处”、“颇令人厌”的小技法；明代的李梦阳也有这样的问题，不过到嘉、隆之时，明代复古派开始“一洗此类并诸拗涩变体”，取其“雄壮阔大”，学到了“杜之骨力风格”。

综合上述可见，无论是学习杜甫的五律、七言拗体，或是学习全篇精华、字词句法，胡应麟都有一个论述模式，即：宋人很差，明人（复古派）很好。胡应麟之前边的复古派诗论虽有贬宋扬明之意，但都没有明确提出这个模式，如王世贞只是说：“国朝习杜者凡数家，华容孙宜得杜肉，东郡谢榛得杜貌，华州王维楨得杜一支，闽州郑善夫得杜骨，然就其所得，亦近似耳。唯梦阳具体而微。”<sup>⑥</sup>总结了

① 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四，第60、73页；内编卷五，第103页。

② 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四，第73页。

③④ 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五，第93页。

⑤ 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五，第104页。

⑥ 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六，第1050页。

明人学杜的情况，并没有归纳出宋人不如明人的具体结论。这个模式是到胡应麟才发展出来的，胡应麟之后的许学夷继承了这个模式，《诗源辨体》中说：

古今说杜诗者不能悉举，大要多穿凿附会，浅妄支离。盖其人兴趣既少，而于唐人玲珑透彻、浑圆活泼之妙既不能知，其质性庸下，于少陵沉雄含蓄、浑厚悲壮之处又不能得，徒以耳食慕少陵，不得已而求之篇格之间、字句之末，故不免于支离穿凿耳。王元美云：“王允宁生平所推伏者独杜少陵，其所好谈说以为独解者，七言律耳。大要贵有照应、有开阖、有关键、有顿挫，其意主兴、主比，其法有正插、有倒插。要之，杜诗亦一二有之，不必尽然也。”山谷亦云：“彼喜穿凿者，弃其大旨，取其发兴于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鱼虫，以为物物皆有所托，如世间商度隐语者，则子美之诗委地矣。”愚按：说诗至此，自是子美厄运；至国朝弘正诸子学杜，则杜学始昌也。<sup>①</sup>

许学夷赞同王世贞对王维桢（1507—1556）的意见，杜诗虽然可以从开阖、顿挫、正插、倒插等方面去学，但要注意这只是杜诗的枝节；至于黄庭坚提到的宋代那些“喜穿凿者”完全“弃其大旨”去看杜诗、去学杜诗，则对杜诗来说是一种“厄运”；只有到明代弘正前七子的时候，“杜学始昌”。这里显示的“宋人差，复古派好”的思路与胡应麟一脉相承。

值得注意的是，许学夷这段话还暗含另一层意思：这些“穿凿附会，浅妄支离”的“说杜诗者”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他们“于唐人玲珑透彻、浑圆活泼之妙既不能知”，“于少陵沉雄含蓄、浑厚悲壮之处又不能得”，也就是说，既不懂盛唐的妙处，又不懂杜诗“高于盛唐”的同时还要“不失为盛唐”，一味地只专注于“高于盛唐”的那一边，只追求王世懋所谓的“深句、雄句、老句”和“轻浅子弟”所崇尚的“险句、拙句、累句”，学杜必然走向歧途。王世懋进一步说：

然其诗曰：“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曰：“新诗句句好，应任老夫传。”温然其辞，而隐然言外，何尝有所谓吾道主盟代兴哉？自少陵逗漏此趣，而大智大力者，发挥毕尽，至使吠声之徒，群肆剥，遐哉唐音，永不可复。噫嘻慎之！<sup>②</sup>

王世懋批评那些“吠声之徒，群肆剥”者导致“遐哉唐音，永不可复”，“唐音”竟然失而不复了。这也就意味着，学杜学得好、学得高，就可以是“唐音”，胡应麟、王世懋、许学夷等复古派坚信他们学杜承接的是开元唐音<sup>③</sup>；学得坏、学得低下，唐音“永不可复”，其面目就变成有宋一代的宋诗。

故而可以说，对于复古派诗论家来说，虽同是杜诗，他们在学杜问题上竟然看出了唐诗与宋诗的差别。这个唐、宋差别的根源就在于能否认识到杜诗“高于盛唐”而“不失为盛唐”的特点。

## 六 清人的认同

复古派诗论家对杜诗的这种态度，影响了清代的诗论，清代重要的论诗家都或多或少地吸收了复古派的观点。如王渔洋（1634—1711）认为：

七律宜读王右丞、李东川。尤宜熟玩刘文房诸作……然后取杜诗读之，譬如百川学海而至于海也。此是究竟归宿处。<sup>④</sup>

同样主张先从王维、李颀等入手，尤其要熟悉刘长卿，最后才学杜，认为这样是百川归海，“究竟归宿”。

① 许学夷《诗源辨体》，第217页。

② 王世懋《艺圃撷余》，第777页。

③ 如从胡应麟对七言律的看法上也可以看出此意。《诗薮》：“七言律开元之后，便到嘉靖。虽圭角巉岩，铈颖峭厉，视唐人性情风致，尚自不侔；而硕大高华，精深奇逸，人驱上驷，家握连城，名篇杰作，布满区宇。古今七言律之盛，极于此矣。”（见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五，第103页）虽认为与唐人性情风致还“尚自不侔”，但已经达到“古今七言律之盛，极于此”。

④ 渔洋夫子口授、何世璠述《然鐙纪闻》，丁福保辑《清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20页。

王渔洋的先学别家然后学杜的思路与明代复古派相仿。

沈德潜(1673—1769)认为:

杜诗别于诸家,在包络一切,其时露败缺处,正是无所不有处。<sup>①</sup>

与明代复古派的“高于”而“不失”相似,沈德潜也认为杜诗有别于其他诸家有两面性,“露败缺处”与“无所不有处”同时具备。在《唐诗别裁集》中也指出:

杜七言有不可及者四:学之博也,才之大也,气之盛也,格之变也。五色藻绩,八音和鸣,后人如何仿佛?王摩诘七言律风格最高,复饶远韵,为唐代正宗。然遇杜甫《秋兴》、《诸将》、《咏怀古迹》等篇,恐瞠乎其後,以杜能包王,王不能包杜也。中有疏宕一体,实为宋元人滥觞,才大自无所不可也。然学杜者,不应从此种入。凡名家诗有名句可采,如郑鹧鸪、崔鸳鸯、赵倚楼之类是也。杜诗议论正,器局高,却无名句可采,所以彦恢高氏独列为大家。<sup>②</sup>

老杜诗中的“疏宕一体”为“宋元人滥觞”,所以学杜不能从这种体入手。这种说法也类似明代复古派所探讨的“高于盛唐”的一边导致了唐、宋诗之别。

其后的潘德輿(1785—1839)也有着和复古派及沈德潜近似的看法,《养一斋诗话》说:

杜诗一首之中,好丑杂陈……然杜之拙处在此,其高出千古处亦在此。<sup>③</sup>

潘德輿指出的杜诗“拙处在此”、“高出千古处亦在此”的两面性显然受了前人的影响。袁枚(1716—1797)则直截了当地说:

论诗区别唐、宋,判分中、晚,余雅不喜……杜少陵之“影遭碧水潜勾引,风妒红花却倒吹”、“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琐碎极矣,得不谓之宋诗乎?<sup>④</sup>

袁枚称自己论诗不喜欢分别唐、宋,举例杜诗的琐碎之处,就是宋诗,可见袁枚也意识到了杜诗中的唐、宋之别。

## 七 小 结

胡应麟对杜诗有一个很有见解的看法,他说:

大概杜有三难:极盛难继,首创难工,遘衰难挽。子建以至太白,诗家能事都尽,杜后起集其大成,一也;排律近体,前人未备,伐山道源,为百世师,二也;开元既往,大历继兴,砥柱其间,唐以复振,三也。<sup>⑤</sup>

胡应麟指出的杜甫的三难,很精炼地概括出杜诗的成就、意义和地位:在“极盛难继”之时而“集大成”;“首创难工”开“排律近体”而成为“百世师”;“遘衰难挽”之时而连接开元与大历“砥柱其间,唐以复振”。有趣的是,复古派恰恰在杜甫这三项成就中发现了问题:在“集大成”中发现了杜诗“会萃前人在此,滥觞后世亦在此”;在开“排律近体”中发现了杜诗的“正体”、“小变”、“大变”;在连接开元与大历的“砥柱其间,唐以复振”中发现了盛唐与大历之后的区别、“唐诗”与“宋诗”的区别。这就是明代复古派诗论对杜诗最为别致的态度。

[作者简介]李思涯,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博士。发表过论文《王维七律的历史论述》等。

① 沈德潜《说诗碎语》卷下,《清诗话》,第555页。

② 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卷一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447页。

③ 潘德輿《养一斋诗话》卷一,郭绍虞选编、富寿荪校点《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018页。

④ 袁枚著、顾学颉校点《随园诗话》卷七,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42页。

⑤ 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五,第91页。